

曾经数十万人 正在消失的重庆“棒棒”

冉光辉试着送外卖,做了两单,不干了,现在仍旧在大正商场里当自己的“棒棒”。靠着这个,冉光辉养活了家人,甚至在重庆市中心买下一套房。

山城重庆沿山而建,四面八方都是山。这样的地形下,扛着一支竹棒两根绳索,在街头接活儿谋生的人,成为都市搬运的重要力量,他们被叫做“棒棒”。

数据统计,随着城市化进程,“棒棒”从一度的数十万人一直在逐年下降。

目睹着行业的消亡,冉光辉也开始尝试转型。偶尔,他会打开大号直播打光灯,对着

手机前置摄像头推销奉节脐橙,身后的墙上贴着许多脐橙的包装箱纸壳。拍视频、做直播,他一半为了自己开心,另一半,或者是为了试水电商。

可这些都不耽误他每天去大正商场“上班”。嘴里叼着11块钱一包的香烟,肩上扛着一两百斤的货物,他穿梭在密密麻麻的店铺之间,上楼梯跑得比别人下楼梯还利索。

扛着家庭的冉光辉,今年52岁了。当年的小儿子正读初三面临中考,商场里的老兄弟还在干的只剩十几个。他有危机感,这危机感来自岁月累积,来自一整个“棒棒”时代如嘉陵江水一般地轰隆远去。



▲近日,冉光辉在大正商场扛货。



▲2010年6月20日,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拍下冉光辉牵着儿子扛货的照片。

送了一天外卖

“有人说我送外卖去了,其实就去了一天。”冉光辉说,2021年年底,随着“双12”落幕,“棒棒”生意开始进入淡季,在别人的建议下,他尝试去送外卖。本来想着这活儿不会比当“棒棒”更辛苦,但是真的跑一下,他发现

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在地形复杂的重庆,每一个陌生订单的具体位置,冉光辉都要琢磨很久。“爬上爬下,有些地方没有电梯,累得很。我又不会骑车,送货全靠腿。”只跑了2单,冉光辉就放弃了。“1单4.5元,加

起来9元钱,还要被平台扣3元。这个钱不好挣。”

一个“棒棒”改送外卖,可能并不是什么稀奇事,可这个“棒棒”是冉光辉,就引来了很多关注的目光。

2010年,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拍到冉光辉牵着儿子

送货的照片。后来经过自媒体二次传播,冉光辉一手拽着背上几乎和自己等高的货物、一手牵着儿子的形象,一夜间传遍全国。有人说他“肩上扛着家庭,手里牵着未来”。

现在,他“转型送外卖”的消息,再次引来媒体的关注。

沾灰的棒棒

早上八九点,大正商场的商家们陆陆续续拉开卷帘门营业。

冉光辉把自带饭盒放进运货通道一个不起眼货架的顶端,再往深里走两步,从狭窄的没有什么灯光的角落里拖出自己的平板推车。

“来了?”“啊。”一路上遇到同行或者商场管理人员,冉光辉会简单寒暄两句,但脚下从不迟缓。走到5楼,他把推车在老位置放好,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“棒棒”,冉光辉每天会先和相熟的店面老板打招呼。他的业务集中在4楼和5楼,今天有没有货要发、有多少、

什么时候发、发什么快递,冉光辉上上下下溜一圈,心里就能有点谱,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脑子里徐徐展开,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取货、发货。

对针织品市场的“棒棒”来说,一年也要分淡旺季。夏天算淡季,衣服轻薄,箱子数量就减少,重量也轻;到了冬天,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,1张订单得要多发几个箱子,就能多赚一点钱。但这样的箱子沉,冉光辉记得自己背过最重的1箱东西超过了400斤。

虽然是这个市场生意最好的“棒棒”,但这几年越发觉得生意艰难。“现在和十几

年前没法比。那时候一个铺子一天发七八件甚至十多件货出去,现在,有些铺子两三天发一件。”

扛活儿的时候,冉光辉不回答任何问题,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通道中,常常一扭头就不见了,只在午餐时间等工作间隙才会放松下来。“这个商场里,最开始大几十个‘棒棒’,现在只剩几个人了。也没有新人入行,我搞不好都是这里最年轻的。”

在这一天的工作中,用肩膀背、用推车拉、用电动车运……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里一个下水管背后,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过用场。

这是一根俗称“硬头黄”的楠竹,显然用过很多年,磨得油光滑亮。但现在它蒙着一层薄薄的灰,大部分的时间里站在粗壮的白色塑胶水管背后。这里还塞着几根棒棒,颜色各不相同,粗细差不多,长约1米,看起来都已经很久没人用了。

冉光辉始终觉得,做“棒棒”是卖力气、上不得台面的工作。但他不知道的是,“棒棒”早已经成了重庆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,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、勤劳自立,2009年,在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,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“棒棒”群体入围前50强。

午夜“棒棒军”

作为行业明星,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。“现在的娃儿都读过书,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个苦?”

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,比如23岁的付家林。“进厂打工不好,要求太多。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”,当“棒棒”是做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,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。

2月26日晚上,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最累的一单。

“今晚这单10个人够了,你安排一下。”收到朋友邓常飙的短信后,付家林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尹和黄世斌等人,到了午夜时分,一行

人到了地铁站内,看到要搬运的货物时,邓常飙的脸色已经不太好。“客户只说了不会超过500公斤,我本来以为是自动售货机,结果是个安检仪。”

根据机器上的铭牌,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。10个人能不能搞得定,大家心里都没底。“两边都伸出来一截,不好承力;棒棒也带得不对,太短了,要两根3米的才好弄。”老尹做“棒棒”多年,有技术能扛重,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。他绕着机器走了两圈,觉得头疼。“来吧,动手。”老尹一声招呼,人群呼啦啦围上去。

4条1米多长的棒棒,四

个角上各用1条,每条架在两个人肩上。年轻小伙子顶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劲,老尹和黄世斌拼着老骨头,在最前方开路。“预备,起!”两人的额角暴起青筋,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顶的手臂上血脉贲张。邓常飙也在队伍里,他身形瘦弱,使不上太大力气,但也尽力往上顶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,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级台阶,“不得行不得行!放下来!”

有人开始抱怨,觉得光是这一台机器今晚都搬不上去:仅这一个地铁口,就有三个坡道,加起来将近200级台阶。

大拇指粗的绳子被松开,重新调整打结;年轻人们

肩膀稚嫩,安排到不那么吃力的地方……休息了15分钟,10名“棒棒”再次上阵。

“嘿咗!”“嘿咗!”“嘿咗!”“嘿咗!”上一步台阶,呼一声号子,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、扛在肩上,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。还差最后一坡,就能抬上地面,老尹仍能坚持,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,付家林被顶上去,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。

16级台阶,走到第12级时,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“雄起!”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,从肩膀滑到了脖子。他用尽力气,撑完最后4级。

“棒棒”已经消失

聚集在一起的午夜“棒棒军”,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。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:在工地打工的、还在校读书的、做平面设计自由职业者……“棒棒”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,在他们的选择中,“棒棒”大多是用时间和精力,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。

这个“次要选择”,自己能做多久?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,但作为老前辈,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,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,他还试过直播卖脐橙,也拍小视频。“明星棒棒”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,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。

“有公司找过我,说要签约合作,没得意思。”他看过一些合同,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,钱不能现结、直播时间有规定,连收入都是三七分账,自己只拿三成。

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,许多“棒棒”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。转行送外卖的、上工地的、进厂的、去开滴滴货运的,都有。

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许康平,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,在他看来,“‘棒棒’已经消失了。”许康平说,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同学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“棒棒”生存现状调查,最后的结论是目前“数量已不足2000人,且以老年人居多。”

“或者说,‘棒棒’已经消失了。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,个体的存余不影响‘消失’这个判断。消失不是等于零,而是约等于零。”许康平有些惆怅,他想,新出生的孩子们,恐怕不会再有“棒棒”这个概念了。(新京报)